

我党抗战时期战争动员的成功实践与启示

■ 邓一非 郭志普 张晓冰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目标明确的动员方针、正确有力的动员策略、灵活高效的动员方式，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彰显卓越的战争动员能力，形成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团结抗战的局面。这一成功的战争动员实践，是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是彪炳中外战争史的光辉篇章，对思考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国防动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政治动员和思想动员相融合

政治动员是战争动员的核心，对赢得战争起着全局指导、方向引领的关键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围绕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进行了强有力的战争政治动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争取一切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等，推动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确立了抗战政治动员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方略。

思想动员是战争动员的重要基础，是实施政治动员的必要途径和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进行了广泛深入、成效显著的思想动员。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动员感召下，1935年“一二·九”运动，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1937年8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是全国性抗战伊始，为推动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思想动员。1938年6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有力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为深入开展抗战政治动员和思想动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正是深入持续的思想动员，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团结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国防动员工作的

全面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贯穿于国防动员各领域、全过程和各环节，积极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政治动员、思想动员的新策略新模式。

民众动员和军队动员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并强调，“什么是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关乎民族国家存亡的反侵略战争中，把动员人民视为战争动员的重中之重，坚持民众动员和军队动员相结合，让人民战争登上了广阔的历史舞台，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针对被分割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和日伪占领区的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教育动员民众，凝聚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全体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用血肉筑起抵御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堪称战争动员的经典范例，用事实印证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动员，突出体现在对军队的改编和开辟敌后战场。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国共产党主动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不仅军事上的重大调整，也是对军队深刻的战争动员，形成了国共两党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及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健全动员委员会，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普遍建立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坚持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采用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3年，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得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响应和积极推广，这是党领导广大军民团结一心、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创举。实践深刻表明，“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战争动员的根本依据和关键所在。新时代国防动员必须着眼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独特优势和整体威力，不断巩固发展军民团结，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构建打伏型国防动员新格局，提高参战援战保战能力，汇聚强国强军、打赢制胜的强大力量。

军工动员和生产动员相配合

战争离不开武器装备、物资供给的支撑。中国共产党针对抗日根据地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在战争经济动员上突出军工动员和生产动员相配合，有力克服武器缺乏、物资补充不足的严重困难，为开展敌后抗战提供了急需必需的物质保障。为适应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军工动员。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一封电报中指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明确，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中央军委成立军工部，八路军和新四军相继成立军工部，创建黄崖洞、茅屋等一批兵工厂，创办培养军工技术骨干的“太行工业学校”，并不断增加对军工的人力、物力投入，推动枪械技术、冶金技术和化学技术的发展，设计研制出“八一式”步枪和迫击炮、掷弹筒等武器，开启军工批量生产新历程。当时，由于抗日根据地还不能生产钢材，就广泛发动军民拆运铁轨、收集废铁，以满足制造武器所需。同时，广泛开展群众性熬硝运动，以满足制造火药的大量需求。到1945年初，各根据地共有大小兵工厂134个，共生产手榴弹450万枚、地雷20万个、子弹800万发、枪械1万多支、枪榴筒和掷弹筒6000多个、迫击炮9000多门。由简单修械发展到以制造武器弹药为主，满足了抗日军民对武器弹药的需求，成效斐然的军工动员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建设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经济。1939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响应党中央号召，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掀起军民大生产运动，制定“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厉行节约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中央和边区各级领导干部模范带头，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军民一体，上下一心，开垦荒地、种植种菜、喂猪养羊、纺织织布、缝衣做鞋，人为地发展生产贡献力量，涌现出三五九旅以及吴满有、赵占魁、杨步浩、郭风英等典型。到1943年大生产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根据地粮食和生活日用品已全部或大部分自给。这一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为巩固抗日政权、支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打了一场值得称道的“经济战”。

打仗就是打经济实力，军事上的胜

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上的支撑力度。必须针对现代战争高技术、高强度、高消耗的特征，深刻把握战争经济动员的发展趋势，着眼把综合国力特别是国民经济实力、现代化生产能力转化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实力，加强军事需求和国防动员供给对接，提高国防经济动员的体系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增强打赢未来战争的经济潜能。

社会动员和文化动员相契合

社会动员主要是整合社会资源，促使社会成员形成支持战争的统一意志和行动。文化动员重在发挥文化的特有功能和优势而增强战争动员的成效。毛泽东同志强调，动员群众有效的方法“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而是“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并注重运用多种形式展开文化动员，使抗战动员更加深入人心，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借助政治地位合法化的契机，迅速恢复和加强被破坏的宣传机构和队伍，在国统区设立承担一定宣传职能的八路军办事处，开办发行《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日》《群众》等报刊，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激发全民抗战意志，坚定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有计划、有目标的舆论宣传成为社会动员的有力武器，当时吸引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在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创办报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出墙报、画壁画、放幻灯、讲时事等形式，大张旗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态势，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热情高涨，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抗日主战场。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抗战文化运动，宣传文化队伍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前线、农村，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现实、鼓舞斗志的优秀作品。《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等歌曲，《放下你的鞭子》《白毛女》《兄妹开荒》等剧目，《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电影，《小二黑结婚》《荷花淀》等文学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抗战精神，是以艺术的方式进行富于感染力的战争动员，彰显了“文化抗战”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战争动员以胜战为目的，具有时代性、综合性、创新性的特征。新时代国防动员必须创新发展实现路径和形式，为社会动员、文化动员注入新的“时代元素”，推动动员领域向科技动员、认知动员、数智动员、媒介动员延伸拓展，汇聚一切为战所用的力量，形成多域多能的国防动员能力。

中，还应根据实际需要，动态调整协同方案，确保方案实用管用。推进资源共享共用。制定应急装备物资联储联供机制，建设联合存储基地，集中存放和管理应急装备物资，实现军地装备物资的统一调配和高效利用。搭建集成化应急信息系统，整合人力、物资、灾情等信息，支持实时更新与数据分析，为装备物资共享提供信息支撑。强化随机协同能力。无论是抗洪抢险还是抗震救灾等应急行动，突发情况比较多，需要在按计划协同的同时，强化随机协同意识，根据抢险救灾现场实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协同配合，把力量、物资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保障要高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复杂多变的灾害现场，保障能否及时、持续、精准到位，是维持民兵分队应急救援能力、确保行动能力不降的关键支撑。完善保障预案。制定详细的伴随保障预案，涵盖油料、给养、被装、急救药品、工程耗材等多个方面；明确保障力量编成、前送路线、补给点设置及伴随保障方式。丰富保障手段。保障力量应尽可能靠前配置、伴随行动。探索使用模块化、轻型化、越野化的保障装备，提升复杂地形下的伴随保障能力。灵活运用无人机投送、摩托化运输、人力背负运送等多种手段，确保急需物资直达一线民兵分队。突出保障重点。建立动态、灵敏的保障需求反馈机制，确保一线民兵分队能及时上报保障需求信息，保障部门能迅速响应、动态调整保障计划与资源投向，重点保障主要方向、关键点位和持续作战的民兵分队。另外，完善社会资源预征预储制度，与相关企业签订保障协议，充分保障救援补给需求。

国防漫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山西，阎锡山判断日军将以大同至雁门关为主攻方向，并拟制了一个“大同会战”计划。然而事与愿违，日军主攻方向恰恰选在阎锡山原以为最安全的地带——灵丘至平型关。日军主力选择的进攻路线，地形复杂，为用兵之大忌。如果不是对地形了如指掌是不敢冒这个险的，阎锡山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联想到一件事：1936年夏，阎锡山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板垣征四郎，曾到山西拜访过他。板垣一不坐火车，二不坐汽车，而是“徒步旅行”，走的正是这条路。日军第五师团之所以敢于直插阎锡山晋绥军的背后，是因为这个师团是板垣率领的。

板垣征四郎以拜访老同学之名，却行窥探山西地形及军事情报之实，此事出现在我东北和华北大片国土沦陷之后，其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然而，阎锡山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仍以“朋友来了有好酒”的盛情来款待对手，足见其思想麻痹到何种程度。关于“忘战”这一点，著名抗日救国运动先锋邹韬奋就曾撰文痛陈：“我们目前切齿痛恨暴日在东北之横行，但他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在实际上做准备工夫者近三十年，我们在近三十年中曾经有何自救的准备？到了强盗升堂入室，白刃加头，纷纷有义勇队敢死队征兵制等等的呼声，可见平日对外侮并无线毫的准备。”

古人讲，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自败，尔后败之。历览古今，一些战争之所以让人深感意外、猝不及防，其实并不是战争发起者有多狡猾、多隐秘，而是受害者自身头脑先出了问题，是思想上的“马放南山”、精神上的“刀枪入库”，才让对手钻了空子。从人类战争史看，绝大多数战争的爆发都有一个酝酿过程以及一定程度的预兆和端倪，关键看你有没有觉察到、是不是有所防范。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每次大战之前日本都会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并以我为假想敌反复组织模拟对抗演练，同时派遣大量间谍潜入我国港口和内陆刺探军情和社情。这些征候本应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然而当权者却被各种虚幻的和平假象蒙蔽了双眼，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视而不见，直至战争爆发方才猛然醒悟，但为时已晚。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秦基伟同志在追忆刘伯承同志时讲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少数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被“和平”麻痹神经。在一次会议上，刘伯承同志把与会的高级干部带到一个训练场，拿起步枪，趴在地上，瞄准靶子，“啪！啪！啪！”连开三枪，然后站起来说：“我岁数大了，又是一只眼，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这一举动，使与会者深受教育。秦基伟同志回忆说：“那三枪，充分反映了一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敌斗争的敏感性……后来的实践证明，谁做

敢于摘“高悬的果子”

■ 宋 斌 张意峰

果树上总有一些果子结在较低的位置，伸手可得，抬手就能摘到，这在经济学上称之为“低垂的果实”。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高悬的果子”，往往需要付出努力才能摘取。当前，打赢实现建军一百周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已经到了最紧要、最吃劲的冲刺期，倒计时的时候、催征的号角，牵动着每一名官兵的心弦。攻坚战路上“高悬的果子”，既是难啃的“硬骨头”、难破的“天花板”，也是躲不开的“拦路虎”、绕不过的“绊脚石”。广大官兵唯有时刻保持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冲锋姿态，敢于向这些“高悬的果子”发起挑战，方有机会嗅其香韵、品其甘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避其难则难愈难、攻其坚则坚必破。敢于摘“高悬的果子”，需要有迎难而上、勇毅前行的勇气。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弹一星”功勋们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打破一道道壘断封锁、突破一层层技术壁垒，成功摘下了国防安全“高悬的果子”。军功簿从来都是竞争前沿，那些强军路上“高悬的果子”，往往孕育着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的契机，摘取过程注定充满艰辛，没有敢涉“无人区”、勇当“探路者”的勇气是不行的。这就要求广大官兵激扬敢为人先的勇气、闯关夺隘的胆气，攻坚克难的锐气，在核心技术上寻求突破，在战训模式上大胆创新，奋力抢占军事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从而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胜。敢于摘“高悬的果子”，需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军人的担当，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意识，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崇高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赤诚奉

时刻牢记『忘战必危』的警示

好了打仗的思想准备，谁的仗就打得主动。”与战争年代相比，我们如今已几十年没打过仗，面对思想麻痹、精神懈怠、心存侥幸的危险，需要我们多来几次“政治打靶”，打掉和平积弊，立起备战导向。

马克思说过：“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正所谓看不到平时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看不到潜在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习用，不可以当敌。”作为肩负新时代新使命任务的人民军队，面对当今强敌对手咄咄逼人的围堵态势，面对无时不在的现实战争威胁，必须不断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深刻洞察时与势，深谋远虑安边，始终如临深渊、如临大敌的清醒练好胜战之功，保持待战之势，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以更周全的戒备、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从冰封雪裹的边关哨所，到烈焰升腾的演训一线；从抗洪抢险的滚滚波涛，到抗疫战场的前沿阵地，人民子弟兵一次又一次用无言的行动诠释了担当的千钧重量。强军征程上“高悬的果子”，从来都不是为怯懦者准备的，而是对担当者的奖赏，如果踟蹰于“摘不到”的畏难情绪，沉溺于“怕失手”的过度忧虑，只会困难挑战面前画地为牢、裹足不前。广大官兵唯有破除“遇到矛盾绕着走、碰见困难躲着行”的庸人哲学，敢于在关键时刻站得出、顶得上，敢于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不断在大风大浪中摸爬滚打，在大事要事中浴火淬炼，才能练好担当干事的“硬肩膀”，挑起强军兴军的“千斤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敢于摘“高悬的果子”，需要有披荆斩棘的本领。起跳是勇气，擒拿是担当，摘取则倚赖实力。没有过硬本领，纵有凌云壮志，亦可能折戟沉沙。军人生来为战战，“弹兵王”王忠信用数千次精准操作夺得“八一勋章”的荣光，凭的是数十年刻苦钻研所练就的逢山开路本事；海军舰载机飞行员团队歼歼-15“飞鲨”战机在航海上快速形成战斗力，靠的是创新“心理压力测试+模拟舱体系”所练就的遇水架桥能力。现代战争形态日新月异，科技含量与日俱增，未来战场对军人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代官兵必须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聚焦备战打仗，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搞清楚，把强敌对手研究透，把每一次演训都当作奋力跃升的坚实台阶，在实战实训中千锤百炼，方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负重托、不辱使命。